

# “文化大革命”

## 论析

金春明

上海人民出版社

---

# “文化大革命”论析

---

金春明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0903320



责任编辑 刘益民  
封面装帧 甘晓培

“文化大革命”论析

金春明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江苏宝应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9.25 字数 173,000

1985年11月第1版 1987年7月第2次印刷

印数 18,601—78,600

书号 3074·740 定价 1.35元

## 目 录

- [ 1 ] 历史的借鉴(代前言)
- [ 10 ] “文化大革命”必须彻底否定
- [ 35 ] “文化大革命”不是革命的群众运动
- [ 43 ] 刘少奇同志没有一条修正主义路线
- [ 57 ] 关于刘少奇同志冤案的形成
- [ 86 ] 上海“一月革命”的前前后后
- [ 114 ] 关于二月抗争的几个问题
- [ 139 ] 九大述评
- [ 150 ] 略论党的九大后的整党
- [ 168 ] 惊心动魄的九一三事件
- [ 187 ] “四人帮”是我党历史上作乱最久的一个反革命集团
- [ 218 ] 四五运动述评
- [ 239 ] 天安门事件与党的领导
- [ 244 ] 为什么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内乱?
- [ 264 ] “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经验教训
- [ 287 ] 后记

## 历史的借鉴(代前言)

一九八一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后,从事社会主义部分党史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同志逐渐增多,有关的材料和专题研究文章也逐渐多了起来,这是很好的现象。前几年,党史研究工作的重点应该放在社会主义部分的观点已经被明确提出来,并且得到越来越多的同志赞成和响应。但是,从总体上看,应该说,专门从事社会主义部分党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的人数量还很少,研究工作还处于初创的阶段。整个党史的研究和教学队伍都是迫切需要充实和加强的。但就比较而言,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研究力量尤为薄弱,与当前的现实需要相距甚远,尤其需要充实和加强。

学习和研究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我认为起码有以下四点:

### (一)对当前有更现实的借鉴作用

历史的作用,就在于借鉴。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察往知来”。这是董必武同志一九五九年视察中央档案馆时

写的一首诗中的一句话。他认为档案工作的作用在于：“创业扩基，前轨可迹。古为今用，功同史册。”而最后概括为一句话，就是“察往知来”。研究历史是考察既往发生过的事情，而目的在于了解现状，指导未来。这样一个意思的话，古今中外很多人都讲过。例如大家常引用唐太宗李世民痛悼魏征时说的那三句话：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里的第二句，以古为镜，就是以史为镜，知兴替，他当时指的是封建王朝的更替。今天引申一步，也就是可以帮助人们认识客观历史规律。革命导师恩格斯认为，历史是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工具。他说，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列宁要求我们，从今天的历史经验中吸取教训以便应用于明天，应用于今天人民还在沉默而不久的将来革命的火焰必将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燃烧起来的地方。毛泽东同志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就是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那么，研究昨天和前天目的何在呢？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论述国民党的时候说：“看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研究昨天，就可以知道现在和将来。毛泽东同志用的是“知道”二字，可以说是历史的借鉴作用的集中而通俗的表述。这是所有的历史科学都具有的作用。

那么，为什么要特别强调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借鉴作用呢？1. 从时间上讲更接近，是属于刚刚过去的昨天。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亲身经历过这一段历史，很多事情记忆犹新。这就提供了一个很有利的条件，使人们可以通过亲身经历来学习。这样更亲切，也更容易理解和接受。2. 从事物的发展上讲更直接。今天很多正在从事的工作和解决的问题，都是昨天遗留下来的，是昨天工作的继续。不研究建国后的党史，就不能了解当前很多事物的来龙去脉，也不易掌握问题的症结所在。从这一点讲，建国后党史中的许多重要问题，既是历史、又是现实，既已经过去，但今天又存在着。这种直接性任何其他时期的历史所不能比拟的。3. 从内容上讲更有共同性。党的十二大提出的任务是“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所以提“全面开创”就是说我们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不是始自今日，过去已经开创了，但是不够完整不够全面。廖盖隆同志在大连党史讲习班上提出一个观点说，建国以后三十五年的历史按其内容可以分为两大段：前七年是以社会主义革命为主的阶段，而后二十八年则是以社会主义建设为主的阶段。这种划分是很有道理的。事实上，一九五六年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已经提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的任务，也做过多次努力，但可惜受到种种因素的干扰，没有能够始终如一坚定不移地实现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因此，这二十八年中的正确与错误、胜利与失败、成功与挫折，无不紫记在我们脑海，与当前的各项工

作息息相关。这些是否可以说是研究这段党史具有更现实的借鉴作用的理由。

## (二) 提供了丰富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

任何工作缺乏必要的经验都是搞不好的。经验从哪里来,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只能从实践中来。正如毛泽东同志说过的:“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也是一样。

当然,作为经验来源的实践,不只限于我们自身和我们一个国家。比我们先进行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些国家的实践,他们的成功与挫折、成绩和错误,会给我们以启发和帮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的历史,对我们也有重要的借鉴作用。但是,最主要的经验的来源,还是我们自己的实践,特别是建国以来三十五年的实践。

在这三十五年中,我们有过辉煌的胜利,也有过严重的挫折,走过曲折的道路,经验就更丰富、更可贵。单以经济建设而论,开国初期,我们在很短的时间里依靠党的正确政策和充分发动群众,迅速恢复了遭受严重战乱创伤的国民经济;接着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坚持了革命和建设并举的正确方针,使社会主义改造和大规模经济建设比翼齐飞。但是,由于我们在巨大的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情绪,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企图依靠群众的革命热情和勇猛冲击去实现“大跃进”,这种不成功的



尝试，使我们付出了三年经济困难的高昂代价。挫折使我们清醒了一些，党中央正确地决定和实行调整八字方针，医治了重大的比例失调，使国民经济重新获得发展。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错误判断，又使我们犯了更严重的错误。“文化大革命”中虽然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去“抓革命、促生产”，但实际结果是造成国民经济空前的大破坏，这个沉痛教训大家都是记忆犹新的。

客观经济规律有一个特点：在平时经济活动比较协调地正常进行着的时候，它好象不存在似的；一旦人们破坏了正常的比例关系，违反了客观规律，那时它就要发挥作用，给人们以惩罚。因此，要认识和掌握客观经济规律，仅仅有正面的成功的经验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反面的犯错误的经验教训。同成功的经验相比，从失败的教训中总结提高的认识，往往体会更深，更能发人深思。正如恩格斯说过的：“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现在，我们不但有了成功的经验，也有了失败的痛苦教训，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比较全面地总结了经验教训，有了在正确方针指引下飞速发展的实践，我们的经验可以说是比较完备了。

今天我们全党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进一步学习和研究这些历史经验，加以总结提炼，得出规律性的认识以指导当前和今后的实践。而在完成这项任务当中，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研究工作，应该是一门不可缺少的能

够发挥重要作用的学科。

### (三)对搞好整党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整党的决定》中明确规定，“这次整党的任务是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其中统一思想又是完成四项任务的前提。统一思想，统一到哪里呢？就是统一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路线上来，这是根本的思想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主要是科学地总结了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拨乱反正的产物；是同党内“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斗争的产物，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产物。

建国以来，我们党犯过右的错误，也犯过“左”的错误，而其中作为主体的错误，正如陈云同志正确指出的，是“左”的错误。经济上“左”倾错误的最突出的表现是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政治上“左”倾错误的极端表现，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思想理论上“左”倾错误的集中体现，就是所谓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而这三者又是紧密相连，相互助长的。不彻底弄清这些东西，彻底否定这些东西，就不可能真正做到肃清“左”的影响，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把思想统一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正确路线上来。而做不到这样的思想统一，其他三项任务就失去了完成的思想基础，这次整党就可能完不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就可能走过场。

而学习和研究建国以来三十多年党的历史，就能够

帮助我们认识作为主体错误的“左”倾错误，是在怎样的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有那些突出的表现，以及它给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造成多么大的灾难性的后果；就可以帮助我们真正认清“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本质，并能够有说服力地去彻底否定它；就可以用大量的生动的事例和丰富的历史经验，充分地论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的正确性。从而更好地发挥党史科学在这次整党当中的积极作用。

#### **(四)有助于理解和阐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里所讲的“长期历史经验”，当然包括整个中国革命的经验，以及外国革命的经验，其中最重要的最直接的历史经验，是建国三十多年的经验。邓小平同志在一次向外宾介绍我国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时说：“中国的经验第一条就是自力更生为主。……苏联在斯大林时期对我们有些帮助，赫鲁晓夫上台后则对我们采取敌视的态度，不仅不帮助我们，反而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威胁我们。在很长一个时期内，美国也敌视我们，直到一九七二年以后才有些变化。……没有外援也有好处，迫使我们奋发努力。”另一条是：“根据我们的经验，

步子也不能迈得太快、太急。过去，我们搞得太急，发生了一些错误，我们叫‘左’的错误，这样，经济发展的速度反而慢了。”邓小平同志这里讲的都是建国后的历史经验。

早在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同志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时，就提出了如何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探索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但是，从提出问题到解决问题，必然要有一个实践经验积累的过程。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量变是质变的基础，只有一定量的积累才能引起质变。人们认识客观规律的过程也是如此。建国以后，对于中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开始很缺乏认识。从建国到毛泽东同志去世，搞了二十七年，逐渐有了一些认识，积累了若干经验，但并没有真正掌握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所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既取得了巨大成就，也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和损失。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的认识才比较正确了，因而社会主义事业也一年比一年好，欣欣向荣，蒸蒸日上。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总结了这样一个人类认识客观事物的普遍规律。他说：“正如七大以前，民主革命二十多年的曲折发展，教育全党掌握了我国民主革命的规律一样，八大以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二十多年的曲折发展也深刻地教育了全党。”“和八大的时候比较，现在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深刻得多了，经验丰富得多了，贯彻执行我们的正确方针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大大加强了。”

当然，仅仅有经验的积累一个条件是不够的。这是不可缺少的客观条件，但还要有一个重要的主观条件，就是要有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这条正确的路线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党的十二大所以能够制定出明确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纲领、方针和政策，正是历史经验的积累达到了质变阶段的表现，也是我们的党中央科学地总结了历史上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恢复和坚持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路线，进行了深刻地再认识而得出的结论。既不是割断历史，用今天的改革否定过去的成就，例如因为农村实行了生产责任制，就怀疑甚至否定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必然性和巨大成就；但又不是停留在过去的结论上，以为那些结论都是完美无缺的。这就要求我们既不能躺在前人和别人的认识和结论上，也不能停留在自己已有的认识上，而要依据时间、条件、地点的变化继续不断地认识。不断地发扬正确的认识，纠正错误的认识，增加新的认识，代替过时的认识。这样，思想才能不断地解放，不断地前进。

我们只要自觉地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不断地进行再认识，本着这样的精神去学习和研究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问题，就一定会对正确认识和阐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作出贡献。

## “文化大革命”必须彻底否定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对“文化大革命”作了正式结论,强调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这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又是现实政治生活中的迫切需要。

一、它关系到能不能彻底肃清“左”的影响。建国以来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伟大成就,也犯过不少错误,其中作为主体的错误是“左”的错误。“左”的错误在我们党内延续的时间长、影响深、危害大。而“文化大革命”就是党内长期存在的这种“左”倾错误的极端表现和完备形态。只有彻底否定它,才能彻底纠正“左”的错误,肃清“左”的遗毒和影响。

二、它关系到对党的领袖和党的指导思想的评价问题。“文化大革命”是在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理论指导下进行的一次错误的实践。这个错误理论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只有彻底否定这个错误理论和在它指导下的错误实践,才能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一生的功过,才能把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论点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严格区别开,也才能够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三、它关系到当前正在进行的整党的成败。这次整党的任务是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完成四项任务的前提是统一思想。全党的思想统一到哪里去？就是统一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路线上来。不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就不能真正领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正确性，就不能保证整党的顺利进行和胜利完成。

四、它关系到能否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党的十二大制定的宏伟纲领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意愿的集中体现。顺利实现这个伟大纲领的一大思想障碍，是表现在各个方面的“文化大革命”的遗毒。只有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才能使每个同志自觉地同党中央保持思想上、政治上的一致，同心同德地为实现祖国的“四化”大业努力奋斗。

### **(一)“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党犯错误的产物**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曾流行一种观点，认为“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长期尖锐斗争的必然结果，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最重要形式，是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的根本保证。因此，是任何一个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后都必须进行的。真的是这样吗？历史经验证明，这种观点从理论到实践都是站不住脚的。

在我国发生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并不是马克思主

义教导我们的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需要进行的、以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为内容的文化革命。而恰恰是一场对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空前大破坏。它也不是马克思主义所阐明的那种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矛盾的基础上进行夺取政权斗争的政治革命，而只是一场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由主观错误判断发动的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夺权斗争，是一场内乱。它不是马克思主义认为需要进行的思想革命。根本不能“触及灵魂”，而只能粗暴地“触及皮肉”。它也不是以发展生产力为主要目标的经济革命。因此，正如《历史决议》中所指出的：“‘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所以，它不可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当然也没有历史必然性。

既然如此，“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会发生呢？有人认为，主要是由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错误造成的。这种说法是不公正的。“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搞错了，他当然要负主要责任。马克思主义从来不否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而且强调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在历史上的巨大作用。但是，归根结底，决定历史发展的不是个人，而是人民群众。一种有亿万群众参加的运动，总是有一定社会历史原因的。“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够发生，最主要的是一九五七年以后在我们党内出现了一种“左”倾思潮。这种以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上的错误为主要内容的“左”倾思潮，发展到系统化和理论化，并被提到党的指导思想的高度，是“文化大革命”



发生的直接的根本的原因。

在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这是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都未能很好解决的重大课题。一九五六年召开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正确地分析了国内的主要矛盾，指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毛泽东同志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这些都对解决这一重大课题做出了贡献。

但是，一九五七年前后国际和国内发生的一些事件，主要是国际上的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国内的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整风之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反对共产党的领导，使我们党改变了上述的正确认识。党的八届三中全会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仍是国内的主要矛盾。对国内主要矛盾的分析 and 批判，是确定党的方针和任务的出发点。主要矛盾判断错误就必然要产生一系列错误。例如，不适当地强调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性，错误地把整个知识分子划入资产阶级的范畴，否定了党曾经作出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正确结论等。这样，从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后，党内就逐渐形成了一股“左”的思潮。